

近代云南西医传人与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¹

钟瑞华¹，赵旭峰²

(1. 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教研室, 云南昆明 650031; 2. 红河学院 人文学院, 云南 红河 661100)

【摘要】: 疾病与瘟疫在历史上一直困扰着云南社会, 传统的治疗措施对之不能进行有效防治, 疫病的肆虐给云南人民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中法战争之后, 西学中的“医疗卫生”知识传入云南, 由此拉开云南公共卫生事业的序幕。但在半殖民地语境下, 疫病、贫困与战乱困扰下的云南地方社会使这一过程充满艰辛与变数。进入民国, 在政府与社会团体的推动下, 社会各界运用多种策略宣传普及公共卫生知识, 具体涉及环境卫生、食品卫生、乡村卫生、传染病防治等方面。这些医疗举措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村、农民的卫生环境, 促进了民众就医观念的转变, 推动了云南公共卫生的体制化建设。

【关键词】: 近代 云南 西医传人 公共卫生事业

【中图分类号】: K29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723X (2018) 11-0113-08

19 世纪 80 年代的中法战争是云南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分水岭, 云南从一个地处西南边徼的偏远省份成为英法帝国主义觊觎的前沿地区。除人祸外, 灾害与饥荒背景下的云南疫病肆虐, 鸦片烟毒蔓延, 妇女分娩及妇幼卫生弊端重重, 致使成千上万的百姓在疾病的折磨中苦苦挣扎, 并给人民造成灾难性的后果。而当时中国传统的治疗性医疗措施不足以帮助人民战胜疾病, 因此, 建立近代医疗和公共卫生体制是政府不可推卸的政治责任。为减少瘟疫对民众造成的破坏, 政府、社会及民众对改善公共卫生和预防疾病加以关注, 克服时局的艰难, 以己微薄力量推动了近代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 把近代医学知识公共卫生注入人民生活与公共政策之中, 为云南近代公共卫生医疗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一、晚清云南地方社会与近代公共医疗卫生事业的引进

云南自古以来就是著名的“瘴疠之区”, 疟疾、鼠疫、天花、麻风等病流行, 多年来疫病夺去千百万人的生命。在西医传入云南之前, 云南人们主要接受传统中医的治疗, 部分少数民族还信仰巫医。但无论哪种, 由于受时代的局限, 对一些疾病尤其传染性疾病无法治疗, 当时的云南除去极少数城市的街道卫生之外, 无公共卫生可言, 而广大农村人口治病投医依赖的是寺院、巫医及中医中药, 基层民众生活在贫穷、文盲、高生育率、高死亡率的落后状态下。人们缺医少药, 卫生知识贫乏, 无力防治疾病; 若瘟疫一旦爆发, 就成肆虐之势, 致百万人丧命。中国近代卫生事业的奠基人伍连德就指出: “堪痛惜各国咸谓传染病起于中国, 闻之不胜忧愤。”^[1]

西医刚传入云南的时候, 其诊治原理、医疗手段、医疗工具等方面与传统中医有明显的区别, 而不通中国传统的“身体”文化和根深蒂固的思想体系, 故其在云南传播犹如内地一样步履维艰、阻力重重。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 寺庙、佛龛、神像及

¹基金项目: 红河学院硕博专项“近代以来红河地区的疫病防控与国家治理研究”

作者简介: 钟瑞华 (1977—), 男, 江西瑞金人, 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教研室副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民族政治学和地方民族文化研究;

赵旭峰 (1979—), 男, 山西长治人, 红河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西南近代社会政治史和地方民族文化研究。

世代相传的信仰才是庇护乡里、驱鬼避邪的吉符。当他们患有疾病或遭遇瘟疫时，首先是向神灵祈求除病，这固然与普遍的文盲有关，但很多接受过教育的人也支持通过祛病仪式来抵御病魔，这不仅暴露了瘟神存在于大众的意识观念里，还凸显出迷信渗透生活的各个方面并阻碍对疫病治疗手段的改进和提升。所以，西医最初在云南地区主要是在贫困的少数民族地区传播，深请西医的传教士对患病的少数民族免费治疗与发放药品，以作为传教的辅佐手段。据史料记载，早在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英国传教士帕格里在昭通县开设诊所，给当地苗民看病与施药，以吸引苗民入教，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将诊所扩建为福滇医院。医院设病床10张，有医师1人，护士1人，勤杂工2人。^{[2] (P410)}福滇医院是为扩大教会的影响服务，效果当然是明显的，病情得到治愈的少数民族群众皈依了宗教，并把教士奉为护佑健康的神灵，吸引了更多的人加入宗教。而在文化相对发达的地区，人们受传统思想体系的影响，普遍相信西医“迷拐孩童，挖眼剖心”的谣传，故而对西医之术深感畏惧，乡人宁可坐以待死也不肯接受传教士的治疗。与传教士传教遭遇的窘境类似，当时西医也没能在这些地区深入传播。

云南开关及滇越铁路的修建，为西医传入云南腹地迎来了转机。由于大量外国领事馆工作人员、商人、工程技术人员、教师、工人等进驻云南，为这些人服务的西医医院也逐渐在通商口岸及主要商业城市建立。如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开设的大法国医院。由于当时来华西医并不多，法国医院还附设昆明西医学校，招收学生15人，有李文珍、李少云、朱俊臣、王运前、张斌、朱琨等人。^[3]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法国领事馆在蒙自县城也开设法国医院，有法籍、越籍医师各1人，看护6人，法式平房30间。^{[4] (P895)}这些医院，开设之初皆只为西方人服务，只是后来才逐步收治筑路的越南人和中国人。

滇越铁路开始修建过程中，法国人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修路工人的患病问题。因为从河口至蒙自的米拉底（今花村），沿着南溪河谷而行，地处热带与亚热带，潮湿、闷热，致使痢疾、瘟疫等传染性疾病时刻威胁着殖民者与工人的生命。所以，当滇越铁路开始修建之时，法国人把修筑滇越铁路的公司总部放在蒙自，并在蒙自修建了一所法国医院，为驻在蒙自的滇越铁路公司职员、海关人员以及在蒙自的欧洲人看病。滇越铁路修筑过程中，有12000名中国劳工牺牲，在南溪河段死亡人数大约有10000人。南溪河谷恶劣的气候，使得法国殖民者不得不考虑在沿线建立医疗机构，来确保滇越铁路公司职员以及欧洲人的健康问题，从而为铁路沿线首次输入西方医疗技术。从1904年开始，在老街资助一座地方军医院，对来自线路最初几公里的施工地段的伤病员给予治疗看护。1905年建立一座专门为欧洲人医病的临时医院，由一名医生负责。第二医疗卫生站在35公里处，附设有临时医院、门诊部，由欧洲籍的医生和护士负责。同时在45公里、58公里、64公里、88公里、127公里处设立了医疗卫生站。1905年底，南溪地段设立了7个大的医疗卫生站，安排了7名欧洲籍医生。在开头的30公里线路承包地，还另设了为本地人治疗疾病的特设医院，其驻地设在3、15和24公里处。1906年初，位于30公里至112公里之间的14个承包段内，每段有一个小型临时医疗所，由一名欧洲护士管理，有几名安南籍护士在其领导下一同给劳工治病，并到工人宿舍出诊。医疗服务部门在1906年内对两种流行病做出了有效的防治工作：只有两人患鼠疫死于老街，但鼠疫被及时制止了，没有蔓延开来，特别是在宁波劳工中发现的霍乱也被及时制止了。患病者被隔离在104公里处的宿营地，有35人被传染而死亡。^{[5] (P213)}恶性传染病能被及时控制，这是近代西医引入云南所取得的一大成就，同光年间的鼠疫之害没有继续在滇南肆虐。毋庸置疑，滇越铁路修筑沿线虽然设置了医疗机构，但是主要是为欧洲籍员工服务，华工的生活则处于悲惨境地，虽然也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治疗，但仍然有许多劳工是因疾病而死。^{[6] (P313~327)}

至于中国劳工的饮食、疾病、卫生状况，一直到1906年以后，才得以改善。在1906~1908年施工高潮期，为使劳工安心工作，法国人增加了一些必要的设施，如添建清洁卫生的宿舍和食品供应点，建造大米贮藏仓塔，保证食堂供应粮食——大米，安装卫生设备等，最后在沿线设立宿营地，方便劳工进入工地工作，建立严密的医疗检查制度，做到每个劳工有一张贴有本人相片的就医卡。^{[5] (P241~242)}熊月之在《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一书中指出：中国人在近代接受西医经历了“疑忌—接触—试用—对比—信服”五个环节。^{[7] (P15)}但筑路工人接受西医的情形与之比较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中国劳工当时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为求保命只得接受西医的治疗。西医的治疗效果很快为筑路工人及铁路沿线居民所认可，其对待西医的态度也就从“疑忌”到直接“信服”。而另一层意义上也说明，近代意义上的卫生制度及“卫生”概念，是西洋的舶来品，其在行为上的近代化也不可避免受到西方的影响。

宣统元年（1909年），在西人开设近代医院的影响下，云贵总督锡良聘请周晋熙在昆明开办以西医为主的云南陆军军医学堂，

聘请意大利人玛茹拉理担任教师，第一班招生学生 20 名，开办一年之后，由于条件差，缺乏器械、仪器、标本，加以玛茹拉理奉调回国，昆明军医学学校只好停办，经锡良设法争取，学生转入天津军医学院学习，毕业后返滇行医，是为云南早期的本土西医生。^{[3] (P407)} 宣统三年（1911 年），留法医生刘鼎在昆明中和巷开设私人医馆，为一般平民服务。

1905 年昆明自开商埠和 1910 年滇越铁路开通，更多的西方人来到云南游历经商。云南因其交通便利，对外贸易繁荣，吸引了更多的洋行和许多国家的领事馆、海关进驻，加上铁路、邮政、电报等近代机构里工作的洋员，在云南的外国人达到一个不小的比例，因而对西医的需求也相应增长。为此，法国人于 1911 年在滇越铁路一等车站开远建立“宏仁医院”，收治对象为铁路公司总经理和欧洲籍高级职员，是为滇南西医创建之始。

总之，晚清云南的近代公共卫生事业由西方人引入到教会分布的民族地区或滇越铁路沿线的城镇，这些地方是西方人居住比较集中的地方，卫生事业的主要服务对象也是以西人为主，其对当时的云南地方与民众影响有限（由于医药、人员的缺乏，教会开办的医疗机构所能提供的服务更有限），但客观上在救治病人、普及卫生知识、预防天花、疟疾等传染病方面均起到一定的有益作用。正是在西方人的影响下，云南地方当局开始重视公共卫生事务，开启了云南现代化医疗卫生事业。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云南新设立的警察总局其职责之一就是管理卫生事务，由巡警道具体负责。宣统元年（1909 年）11 月，警察总局改组为警务公所，内设卫生科，分医务、医学、清洁 3 股，负责省会街道、沟渠、便所扫除、疏浚及视察各区清道夫的工作及渣柜、车马设置等事项。^{[2] (P40)}

二、抗战以前的疫病与公共医疗卫生的发展

（一）北洋政府时期云南的公共医疗卫生起步

民国肇建，卫生法律制度作为国家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国家的近代转型而必然地被注入了近代因素，中国公共医疗卫生事业从此展开。但陈旧的文化思维和混乱的国家政治使得这个过程举步维艰。懦弱的北洋政府把卫生条例编纂成法，但其中多数只是纸上谈兵，在地方上也无法施行。故民初云南的公共医疗卫生被地方军阀混战和权力之争绊住手脚，发展极为缓慢，政府只是在省会警察厅下设卫生科和颁布过《个人卫生防疫条例》（1919 年 3 月颁发），北洋政府制订的卫生条例几同虚设，但这客观上为卫生机构框架的建立提供了法理上的支持。按照规定，卫生科下设保健、防疫、药剂及医事股，各有分工：保健股管理城市街道、公厕的清扫；防疫股负责设立各种传染病院、调查疫情，收治病人，扑灭疫情及对居民接种牛痘；药剂股负责对药商、药剂师的审核、监督、发给和注销营业证，审核医书和药方，以及对卫生试验所的管理；医事股负责对医师、医士、牙医、产婆、针灸士等从业人员的考试、审核，发给或注销营业证，负责对私立医院、诊所的审核、立案、监督、取缔等工作，负责对公立宏济医院的建议、充实和管理。

民国元年（1912 年），法国人租用昆明市场巡津街 35 号为院址，开办甘美医院。由于当时甘美医院的服务对象多为外国人以及华人中的上层人物和富商，因此成为收费高的贵族医院。民国二年（1913 年），车里（今景洪）美国长老会医院创办，有纳尔逊、托马斯等医生坐诊，由于深处“瘴疠”之地，对疟疾治愈颇有帮助。民国九年（1920 年），基督教香港中华圣公会在昆明金碧路购得土地，修建“惠滇医院”，寓意教会为云南的“恩泽”。民国十一年（1922 年），德国传教士在元江县开设协济医院，设病床 20 张，有医师 2 名；同年美国传教士巴克在元江县开设哲理医院。^{[2] (P411-412)} 此外，还有西方传教士在教堂内开设诊所，为当地百姓治病或接生，诸如美国传教士在新平县、德国传教士在峨山县及英国传教士在大理县教堂开办诊所医病。这些西医医院或诊所开始收治中国普通平民，当然能入住外国西医医院的平民当在少数。

云南近代医学体系的建立，是中国人自己创办医学机构的结果。进入民国，云南人自己开设的西医医院和诊所有了了一定的发展。民国元年（1912 年），云南省设陆军医院，周晋熙为院长，李丕章为内科主任；民国三年（1914 年），警察厅设立了警察医院，内设中西医师，后因向民众开放，改称宏济医院。同时，云南省第一批中国人西医师活跃在医院里，他们多为留日学生，如著名的有周仲宣、李俊英（女）；或北洋军医学学校毕业归省的学生，如仇允怀、环建一、李珍、吴翔生、吴鸿格等；也有毕业

于香港大学医院的何光周等人。^{[2] (P407)} 民国七年（1918 年），都督唐继尧恢复了军医学校，任命仇允怀为校长，第一批毕业生有 30 余名，是为云南省培养的第一批西医师。

民国八年（1919 年），省会公安局设立云南卫生实验所，作为药物化验和临床检验机构。虽然云南卫生实验所仍然在省会公安局的附属机构，但其是管理医疗卫生的专有机构，向卫生机构独立迈出重要的一步。同年，吴鸿阁、杨怡茹夫妇创立私立同仁医院，初设病床 8 张，设有内、外、儿科及妇产科。^{[3] (P414)} 民国十年（1921 年），昆明发生白喉、猩红热疫情，发病人数多达万人以上；翌年，省会昆明设立了防疫研究所、卫生促进会、卫生清查队等机构。

此外，云南地方当局在这时期还举办各种医务人员训练班，接种免疫等新型医疗措施，许多长期危害人们身体健康的流行性传染病得到一定的治疗。例如，创办于民国三年（1914 年）的牛痘传习所和创办于民国六年（1917 年）的产婆学校。民国十年（1921 年），云南麻风病医院设立，宏济医院改名为昆明市立医院。1927 年，腾冲人张德辉把东方医院从上海搬迁至腾冲，有病床 40 张。

整个 20 世纪 20 年代，云南战事频仍，民不聊生，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艰难，直至龙云稳定了其在云南的统治后，云南省的公共医疗卫生工作才有了起色。

（二）1928~1937 年间的云南公共医疗卫生事业发展

1. 独立卫生行政机构的设立

1928 年，南京国民政府卫生部（署）在南京成立，中国政府的医疗和公共卫生事业就此开端。根据《全国卫生行政系统大纲》，卫生署通令各省于民政厅内设立卫生处，受卫生部直接指挥监督。没有条件设立卫生处的，可暂先设置卫生专员，办理各省卫生事务。在 1928~1937 年间，卫生署还颁布省市县级卫生工作纲要，成立学校卫生委员会，并将教程和培训标准提上议程。云南省医政较全国多数省份落后，不具备立即设置卫生处的条件，故政府于民国十九年（1930 年）在民政厅第五科添设一等科员 1 人，办理全省卫生行政，改变了过去由警察厅代办卫生行政的事宜。

民国二十二年（1933 年）12 月，云南省民政厅厅长丁兆冠因卫生专员 1 人难以应付全省卫生行政事务，报请省政府批准，废除卫生专员，添设第六科。第六科成为省民政厅下辖一科，科内设保健、防疫、医药 3 股，每股设主任科员 1 人，科员、助理科员 4~5 人，负责办理卫生教育保健行政、医药管理。民政厅第六科的设立，离独立卫生行政机构的筹建更近一步，其职责包括：拟定卫生行政计划，筹设各县区卫生专员，筹定各县卫生经费，计划全省防疫，筹办卫生统计，整理制定卫生法规等事项。

民国二十四年（1935 年），云南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愈益密切，省政府遂令驻南京代表张邦翰请求卫生署派员协助筹划云南省卫生医药事业。卫生署先后指令在云南调查思茅普洱瘴疫的科长姚永政和国际联盟驻华卫生处顾问斯巴丹博士来云南协助筹办。在卫生署的协助下，云南另辟蹊径，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 年）7 月正式成立全省卫生实验处，处长由卫生署委派姚寻源担任。云南省卫生实验处在名字上与国民政府要求设立的“卫生处”还有差别，但已经是独立的卫生行政机构，它直接隶属省政府，编制为 20 人，负责办理全省卫生行政事务，并着手筹建省立医院及县卫生院，促进云南卫生事业的发展。

2. 西医医院及学校的广泛建立

20 世纪 30 年代，云南在龙云治理期间，政治稳定、各项建设有序展开，西医获得更充分的发展，逐渐由外人主办到国人自设医院，由主要口岸商埠到地方县城；从业者也由西方人为主转变为国人坐诊医病。

民国二十年（1931 年），法国人在甘美医院的基础上将大法医院的部分人员和设备并入，成立新的“甘美医院”，医院设有

内、外、眼耳鼻喉科、妇产科等。甘美、惠滇两家外国医院除了为来华外国人与中国富人提供医疗服务外，同时，两家医院也会为中国普通平民服务，每年收治住院合计在 3000 人次以上，年门诊量合计在 65000 人次以上。^{[8] (P183~190)} 这时期除外国人开办的医院外，云南省自己也创办了一些公立医院，比较著名的有省立昆华医院（1933 年开始筹建）、妇孺医院（1933 年开办）、慈群医院（1936 年开办）、云南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1937 年成立）等。此外，还有由私人创办的医院和西医诊所。诸如妇孺医院、慈群医院均为私人开设，医院设有妇科、内外科，设备与技术较好。

西医医院的增多带动了学校的建立，由于技术人才不足和护理人员亟待训练，刺激云南人自己创办的各类医护人员培训学校，西医教育的本土化进程也大为加快。民国二十年（1931 年），云南军医学校重新成立，周晋熙为校长，当年招收五年制本科、三年制专科各一班。两年后，云南大学在军医学校的协助下开办医学专科，招收学生一个班。民国 23 年（1934 年），省会公安局在市立医院内创办省会助产学校，另有私人开办的大理县喜洲医院护士学校。民国 25 年（1936 年），云南省教育厅在省卫生实验处协助下，创办省立昆华助产职业学校，原省会助产学校和喜洲医院护士学校停办，学生转入该校。此外，外国人开办的福滇、惠滇也举办过护士学校。民国 26 年（1937 年），云南军医学校又招生五年制本科一个班。同年，云南大学医学院成立，每年招收 6 年制学生一个班。^{[2] (P408)} 在此基础上，云南省一些条件具备的县城也开始创办公立医院（统称县卫生院）。早在民国 25 年（1936 年）云南全省卫生实验处成立之时，姚寻源（出任处长）便筹备在宁洱、景谷、元江、澜沧、景东 5 县设立卫生院，并在个旧矿山增设 4 个卫生所。随着更多的技术人员的培养，越来越多的县增设卫生院。据资料统计，民国二十五年至二十七年间（1936~1938 年），云南省共设立 32 所县卫生院。^{[2] (P408)} 在滇南红河地区，中外人士设立的西医医院也比较多。依据学者车麟的不完全统计，滇越铁路沿线城市（含昆明、蒙自、建水、开远）所设立医院，共有病床数为 831 张，这个数字占到全省病床总数 1233 张的 67.39%。即使在偏远的滇西腾越地区，也有两所医院：一为公益性的医院“广济医院”，经费主要来自当地商会，对前来治疗的病人多给予免费诊疗；一为商业性医院“东方医院”，由一名中国籍的留日学生创办，以妇科为主。^{[10] (P216)} 所有这些医院，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其主要服务对象已是普通平民百姓，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云南百姓得到西方医学技术的治疗和帮助，免除疾病的痛苦和折磨，重新恢复身心健康。

西医医院的设立和医护人员的增多，使得更多的云南人能得到西医的治疗，治愈他们的疾病和解除疾病带来的苦痛。但这些都主要发生在一些中心城市，对于广大的农村来说，接受西医治疗依然是一个遥远的事情，其卫生状况更令人担忧。另外，卫生事务也并非地方政府的第一要务，其预算经费微乎其微。1930 年与 1931 年，云南省的卫生预算仅有 1.1 万元与 1.2 万元，在政府各项开支预算里是非常少的。^{[11] (P294)} 原本微薄的卫生预算，城市市民尚不能惠及，广大农村居民则更无从受惠。如此情形，是地方政府的漠视和财政投入的不足造成的，卫生工作一度被政府当作是财政上的累赘，云南近代的公共卫生医疗体系的建立必然面临诸多挑战。

3. 开展传染病预防和检疫工作

云南地处边疆，是地方性传染病的高发区，有拒疾、鼠疫、麻风、伤寒、天花等多种，给云南数百万百姓造成巨大的灾难。史料记载，民国二十二年（1933 年），滇南石屏县连续爆发拒疾多年，至 1938 年 6 月间，因拒疾人口减少近三分之一。民国二十四年（1935 年），云南各县调查结果，全省 131 个县中，99 个县有麻风病患者 6384 人，在 1937 年，麻风病患者在 100 个市县中有 6489 人。^{[2] (P208)}

随着西方医学的传入和为更多的人接受，云南地方政府在疾病预防和检疫方面开展工作。民国二十年（1931 年），蒙自米拉底至河口铁路沿线暴发伤寒、疟疾等传染病，为防止传染和扩散，云南省民政厅组织人员在河口、开远、宜良、昆明火车站对旅客进行检疫。^[12] 当地居民对流行的瘴气极为恐惧，又缺少科学的认知，为避“瘴毒”，民众中流行不起早、不吃饱、不洗澡、不脱袄的习气。显然，这些认知对传染病的防治于事无补，只能加重疫情传播。为之，省政府对加大防疫工作变得重视，尤其对麻风病这样令人色变的传染病开始进行隔离治疗，省民政厅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 年）颁布《云南省取缔麻风方法》。二十四年（1935 年），车里美国长老会医院经当地政府同意，在县城南的曼因寨建立麻风村，收治麻风病人 188 名。^{[2] (P411)} 这些举措，让当地对疫病治疗和防治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摆脱鬼神祛病的观念。足见，西方医学的输入及其对疾病的治疗与预防，让人

们对流行病等有了一定的科学认识，从而可以开展对流行病的预防。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七月，云南省设立了卫生实验处，接管并充实原卫生实验所。卫生实验所负责收集全省的传染病疫情，当时规定报告的传染病包括15种，即“霍乱、伤寒、痢疾、斑疹伤寒、回归热、疟疾、天花、白喉、猩红热、流行性脑膜炎、鼠疫、麻疹、百日咳、梅毒、肺结核”。^{[2] (P247)}此外，云南省卫生实验所还承担药品检验、药剂人员培训、制造疫苗和血清、药物分析鉴定等工作。

4. 倡导环境卫生意识

疾病的产生与日常生活环境中的卫生状况密切相关。云南地处偏远，经济开发程度低，民众生活极其艰难，生居的日常环境更是恶劣。在云南的广大农村，村民居住的房屋多为草房、庐棚，屋里空气污浊，蚊子、苍蝇、臭虫、老鼠、跳蚤自不必说，有时农民喂养的家禽牲畜也与人同居一室；厨房饮具污浊，苍蝇满室；村寨粪秽与垃圾到处都是，污秽腐臭，极易滋生病菌。整个云南乡村疾病丛生，瘟疫盛行。云南的城市虽有市政厅、卫生局、防疫所，但市民的卫生意识也不高。为改变这种现状，政府职能部门及医院学校致力于公共卫生常识的形塑，积极倡导环境卫生意识，改良城镇、乡村卫生意识。民国十九年（1930年），昆明市首次使用清洁车收集垃圾；颁布《市区卫生秩序整顿规定》，发动春节扫除，清掏水井。民国二十年（1931年），云南军医学会创办《医学周刊》，每周定期于《云南民国日报》第6版，利用舆论阵地宣传医学及卫生防疫工作，以为国人借鉴。此后又有云南国医学术改进社主办的《国医周刊》和综合性医药月刊《云南医刊》创刊。^{[2] (P15-16)}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蒋介石在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云南成立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指导市民遵守规范，整齐整洁，开展个人卫生和环境卫生运动。在夏季组织卫生动员大会，组织学生到街道进行劳动服务及大扫除。同年，各县设卫生专员，根据民政厅拟定的《环境卫生重要事项（16项）》规定展开工作，包括设置水井、屠宰场、厕所；沟渠及下水道的疏通；街道清扫；菜市、宾馆、浴室、理发店的卫生管理；饮食物的消毒检查；传染病媒介蚊、蝉、臭虫、老鼠、狂犬的扑灭；处理尸体及公墓办理等。但由于资金和技术人员的缺失，各县并没有完全按照规定执行。相对而言，昆明的省卫生实验处会同有关部门对昆明全市751口井进行消毒。凡有传染病街巷内的水井，由警察负责消毒；其余水井由各县、镇自行组织消毒。^{[2] (P119-120)}这些卫生运动为公共卫生在民众中传播提供了基础，但民众的公共卫生观念的彻底改变，并非朝夕之功。

西方的近代医疗体制是在西方工业化与城市化的社会历史背景下逐渐发展起来的，而刚刚被打开国门的中国社会尚是一个农业社会，只是沿海、内地一些城市迅速发展起来，并建立起西方的医疗制度。如广州、上海、天津、北京、武汉等通商口岸与大城市。但云南地区较之沿海、内地更为落后，当时云南的昆明、大理远不及上海、天津等城市发达，蒙自、开远等新兴城市才刚刚发展起来，所以西方的医疗移植到这些地方尚勉强可以适应，更广阔的农村社会经济文化落后及乡民思想愚昧，则很大程度上根本不具备前提条件。在云南的广大农村，当地环境卫生有失整治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如云南漾濞县，医疗落后，地方病大脖子病（甲状腺肿）及眼病几乎无人不有。直至抗战时期，中央赈济委员会滇西边地考察团途经漾濞县，停车时有64位当地人前来围视，竟被发现患大脖子病者31人，约占49%，患眼疾者43人，约占67%。^[13]

近代西医为云南普通民众所接受及以之学理建立起来的近代医疗制度，表明人们的就医观念已经从中医转向西医，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一种对科学思想的接纳和对西医价值的肯定。这种前所未有的改变，已经开始颠覆一个神灵鬼神祛病的世界，公共卫生政策的现代化模型已经崭露头角，以县为管理单位的公共卫生体系在一些县域开始建立。

三、抗日战争中的云南公共卫生

抗战时期是不折不扣的艰难时期，中国卫生事业的发展面临严重的困难，但战争对临床医学的迫切需要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医院的快速发展。更加之云南地处西南大后方，没有像东南沿海地区那样遭受大规模的战争破坏，医疗体系和公共卫生机构在战争中得以初步确立。

（一） 云南卫生处的成立

抗战时期，云南是抗战的后方和援华物资进入中国的重要通道，疾病传播与变异也随着人口流动而加快，战争与防疫的需要促进了卫生行政机构的完善。1937年以后，在云南省卫生实验处的协助下，云南举办的医护人员培训班增多，门类分布也更广泛，有检验班、药剂检验班、助理护士班、助理助产士班等，学制从3个月到1年不等。1938年，云南省政府创办省立昆华医院。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五月，姚寻源辞去全省卫生实验处处长；两个月后，云南省政府又把卫生实验处改隶民政厅。民国三十年（1941年），云南省政府建成仁民医院，同年云南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成立。滇西战争爆发后，云南境内的军队与流民增多，卫生实验处机构扩充为2室4科，各科室都各司其职，职员增加为81~95人。经费由国民政府核发，经费激增至1075.9万元，县卫生院的经费也得到补充。^{[2] (P42)}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云南卫生实验处按照国民政府颁布的《省卫生处组织大纲》规定，改称云南卫生处，统管全省医政，卫生处成为省政府的重要部门之一。一年之后，云南省卫生处成立省卫生处附属医院并在昆明召开第一次全省县级卫生会议。1945年3月，云南省卫生处在滇西成立鼠疫防治委员会。

昆明市卫生局于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元旦成立，自此昆明市有关环境卫生事务，由警察局卫生处移交市卫生局办理。昆明市卫生局建立市区清洁队，设清洁指导员1人，雇佣清道夫300余人；配备马26匹，马车23辆，机动车9辆，垃圾箱134个。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四日，昆明市建立卫生警察，督查整顿市区卫生，并购置木船3只，卡车3辆，清除市区垃圾。^{[2] (P121)}

（二） 县级卫生院的普遍设立

1938年之后，内地沦陷区许多军政机关、工商企业、文化教育机构迁人云南，也促进了西医药的发展。云南作为抗战后方，因为内地医院的迁人和医疗人才、器械的流入，更多地方建立了县级医院。新式医院、诊所不仅办到边地县城，甚至出现在乡镇。滇南的省立个旧医院于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正式开业，下面设有4个卫生所与4个卫生分所。^{[14] (P15)}同年，蒙自县立卫生院也筹建，可治疗一般疾病与新法接生。^{[4] (P895)}

抗战时，姚寻源参加中央赈济委员会滇西边地考察团，赴滇西考察卫生医药情形。他在滇西发现，楚雄、祥云、下关、大理、喜洲、大理、保山、芒市、瑞丽等县都建有卫生院，甚至建有卫生学校。院长都由内地来的经验丰富的西医生担任，他们大多毕业于国内外的著名医学院，所雇用的护士尚有清华毕业的女生。^[13]1942年，云南省政府卫生处在开远设立了开远县卫生院，就证明当地有很大的市场；到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除了滇越铁路医院（前身是宏仁医院）与开远县卫生院外，当时政府统计备案的私营诊所所有5家：范尔生诊所、施介明诊所、甘泉诊所、杨课选诊所、越南护士所，有3名西医师，牙医1人；未经政府备案的西医诊所所有：李忠绪诊所、李忠信诊所、李师曾诊所、陈子明诊所、庄慧宗诊所、王家平诊所、袁质彬诊所等7家，牙医3人，使得开远西医诊所共达14家。而此时开远共有中医师12人，中药铺9家，西药店铺3家。^{[12] (P107-109)}

截至民国三十四年（1945），云南省130个县中建立县级卫生院120个、卫生所28所，几乎每个县都设有卫生院（所）。^{[2] (P408)}尽管这些卫生院医务人员少，经费缺少，无法达到国民政府行政院于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规定的14~29人的标准，但却开启了医疗卫生受众开始由社会上层向全民的转变。

（三） 西医改变人民求医观念

西医药在治疗疾病方面的功效很快就得到边疆民众的认可，一些关注边政工作的学人也看到这一点，并把西医药作为推进边疆工作的切入点。李安宅就认为，边疆工作在实施步骤上“第一应该先以医药入手”。原因在于“我国治边政策，原来只

采形式主义，未能打成一片，现在纵有良法美意，亦难骤尔接受”，所以建立信任是第一步，而医药工作为最好的媒介。^{[15] (P65~72)}近代西方传教士在中国边疆地区（在内地也是如此），吸收教徒，突破困窘的入手方法，均为医疗服务，足证医药服务之“有前途”。^[16]边疆地区疾病众多，足以影响到边民生计，故政府在边疆地区设立巡回医疗队、防疫队，是最受边民欢迎。国民政府基于当时的主客观条件，虽然在实践上并没有全面地去做这些工作，但边疆县镇一些卫生院、私人诊所的建立，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宣传了西医西药。而对一般民众的生活来说，西医开始改变人民求医观念，即求医方式的转变以及相应健康观念等方面的变化。

抗战时期，政府认识到瘴疔的危害及病因，开始对疟疾、鼠疫、天花、麻风、霍乱等传染病进行防治。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云南省设立抗疟委员会，下设抗疟总队和疟疾研究所。抗疟总队部设在昆明省市卫生实验处，在云县、凤庆、思茅及普洱4县各设一抗疟所，疟疾研究所设在芒市。^{[2] (P408~409)}在抗战最激烈的1942年，美国抗疟团曾深入滇西云县，进行滇缅公路沿线的疟疾流行情况调查，协助云县卫生院进行抗疟工作。而当时云南的曲靖卫生示范中心，医院诊所为群众进行了4421例天花疫苗接种和8835例霍乱接种，其中2000例为补种。公共卫生护士对2300个家庭进行了5300次家访，组织了近13000次卫生座谈，进行了4395例天花接种和11000多例霍乱伤寒接种。^{[17] (P184)}

由于缺少医药、疫苗和必要的卫生技术人员，对其他传染病未建立专门的防疫机构。但政府加大对公共卫生的治理，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昆明市环境卫生委员会决定，举办市区乡村环境卫生比赛，组织环境卫生视察队，对不合卫生标准的市区公厕进行改建。改建后的公厕，由公安部门每月发给石灰200斤，雇清洁工1名，逐日清除，撒石灰消毒。

（四）西医对传统中医的促进作用

西医的传入，使传统中医受到强有力的挑战。近代西医在中国的移植，国家政治权力对医疗活动的介入，以及医疗资源的社会整合都推动着西医在中国的发展。云南中医药学和全国一样，都进入困难时期。面对困难，云南中医药界人士尽力维护和发展中医药学。云南著名外伤科医生曲焕章在民国年间创制“百宝丹”等成药，审核合格后公开出售。抗战初期，曲焕章捐献3万瓶“百宝丹”给北上抗日云南第58军、60军。

1939年6月，以穆克瑞为首的“国际防疫委员会第三防疫团”的国际防疫组织在云南期间，就对中医药典的研究表示出相当的关注。因此，麦肯兹博士（Dr. MacKenJie）特别提醒穆克瑞，注意收集任何有关中医药典研究的新成果，并把它刊登在卫生处的月刊上。因此，穆克瑞走访了地方从事中医、中药的人士，并和一位多年来在昆明、贵阳专门从事中医中药的刘医师往来，自己也在昆明从事中医的研究，在给远在日内瓦的拉斯内的书信中，他还写道：“我相信中国药典能引起您在日内瓦的最大兴趣。”^{[18] (P288)}

抗战时期，云南的公共卫生事业在严峻的战争形势下仍然取得重大成就，展示了政府对公共卫生和预防性医疗的专注。公共卫生与医疗服务几乎在全省范围内开创，缓解了战争时期疫病在后方的传播，揭示卫生工作对于维护公共秩序的重要性。到抗战结束的1945年，公共卫生作为一种理念和行动机制，借助战时动员予以在云南广泛提倡，其内涵逐渐被民众和政府接受和执行。

在云南近代历史上，在应对瘟疫的侵袭中，医疗卫生工作具有特殊的地位与重要的价值。尽管公共卫生刻不容缓，但由于军人政府的漠视和财政投入的不足，云南近代的公共卫生医疗体系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面对瘟疫对民众造成的巨大破坏，政府、社会及民众对公共卫生和预防疾病虽然也加以关注，克服时局的艰难，以己微博力量推动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但是，各类医疗卫生机构由于初创，限于当时的医疗水平，尤其云南省经费、药械缺乏，卫生技术人员短缺的特殊情况，能受益的民众很少。云南近代公共卫生医疗体系的建设仍需要各方面力量的合力推进。

参考文献

-
- [1] 伍连德. 论中国当筹防病之方实行卫生之法[J]. 中华医学杂志, 1915, (1).
- [2] 云南省卫生厅. 云南卫生通志[M]. 昆明: 云南科技出版社, 1999.
- [3] 佚名. 内科学—神经系、呼吸器、血液病、泌尿器—新陈代谢病篇[M]. 云南军医学校讲义, 民国印制, 出版年不详.
- [4] 蒙自县志编纂委员会. 蒙自县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5.
- [5] 法国滇越铁路公司, 印度支那铁路建筑公司. 滇越铁路[M]. 内部资料.
- [6] 贺宗章. 幻影谈[M]. 善本.
- [7] 熊月之. 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 [8] 李建恩. 民国时期昆明的医院[A].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昆明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昆明文史资料选辑(第 22 辑)[C]. 内部发行. 1993.
- [9] 车麟. 滇越铁路与近代云南近代社会观念变迁[A].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 (3).
- [10] 康春华. 1922—1931 年腾越海关十年报告[A]. 杨福泉. 中国云南文化研究 2012[M]. 昆明: 云南科技出版社, 2013.
- [11] 刘远明. 西医东渐与中国近代医疗体制化[M]. 北京: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09.
- [12] 赵翠珍. 十九世纪以来开远医疗卫生概略[A].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开远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开远市文史资料选辑(第 5 辑)[C]. 内部发行. 1992 年.
- [13] 姚寻源. 滇西边地卫生考察[J]. 中华医学杂志(第 25 卷), 1939, (4).
- [14] 个旧市志编纂委员会. 个旧市志[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8.
- [15] 李安宅. 边疆社会工作[M]. 北京: 中华书局, 1944.
- [16] 杨天宏. 救赎与自救—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研究[M]. 北京: 三联书店, 2010.
- [17] JOHN R. WAIT(华章). 悬壶济乱世: 医疗改革者如何于战乱与疫情中建立起中国现代医疗卫生体系(1928—1945)[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5.
- [18] 钟文典, 方霖. 抗战防疫进行时: 国联防疫分团在广西(1938—1940)[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 2014.